

# 明朝家家向道

## 张三丰重振世人信仰

文 / 刘晓

“神布沧浪祖祈求有我，恩德满乾坤民众信仰无疆”，这是湖北武当山位于金顶的太和宫的楹联，而民众信仰的正是道家之神。明朝人广泛崇道是从明成祖朱棣开始的。在其后的整个明代，从帝王到百姓均普遍崇道，而这与盖世真人张三丰的巨大影响是分不开的。无疑，正是游走在世间、留下诸多神迹的大道张三丰，重振了人们对神和修道的信心。

### 明成祖相信有真仙



在历史上，能够被几代皇帝寻访、封号的真人，恐怕非张三丰莫属。在明朝两百多年间，几乎各代皇帝都寻访过他。

明太祖朱元璋久闻张三丰的大名，曾两次下诏并派人遣使寻访，但没有找到。朱元璋的儿子湘王朱柏听说他的名气，也亲自到武当山来寻找，但依然没有寻到张三丰的踪影。据《大岳太和山志》载，朱柏非常沮丧，就写了一首《赞张三丰仙诗》：“张玄玄，爱神仙。朝饮九渡之清流，暮宿南岩之紫烟。好山劫来知几载，不与景物同推迁。我向空山寻不见，徒凄然！孤庐空寂大松里，独有老弥松下眠”。而张三丰之所以不现身，这是因为他知晓，帝王自有其“道”，不能以“金丹液分人主励精图治之思”。古代方士惹出祸端的最根本原因是“因游仙入朝”。

信神的燕王朱棣继位后，为了感谢真武帝在靖难之役中的护佑，下令以真武帝为护国大神，下诏封其为“北极镇天真武玄天上帝”，并在京师御用的监、司、厂、库等衙门中，全都建有真武庙，庙中供奉真武帝塑像，左右两旁塑龟蛇二将，以彰显真武帝的神武。朱棣还在朱元璋颁布的《大明玄教立成斋醮仪范》中，增加了祭颂真武大帝的乐章，成《御制大明玄教乐章》，通行全国。

此外，朱棣亦在北京兴建了一些供奉道教神灵的建筑物，如天坛、天将庙和关公庙等。天坛供奉的“皇天上帝”，即玉皇大帝。“上帝”

的徽号是宋徽宗时所加。朱棣还在内宫建有玉皇殿，供自己和内宫中人奉祀，玉皇殿在明朝灭亡前被崇祯帝毁掉。而其在真武帝修道升天之地武当山大修宫观，更体现了其崇道之心。

自然，朱棣对坊间流传诸多神迹的张三丰非常感兴趣。《张三丰全集》记载，永乐四年，侍读胡广上奏张三丰深有道法，广具神通。于是，朱棣派给事中胡茨同宦官朱祥四处寻访，走遍了荒原边境，却没有找到。永乐十年，朱棣一再召来张三丰的弟子，让他们寻访张三丰。朱棣还亲自写了封信，信中说自己“久仰真仙，渴思亲承仪范”，虽“才质庸疏，然而至诚愿见之心夙夜不忘”。

降尊纡贵的朱棣，给了张三丰空前的礼敬，但是张三丰依然没有前来，只是写了一封短信并赋诗一首，让其弟子孙碧云转交给朱棣。短信中希望成祖“澄心治理，屏欲崇德，方土金石勿信为佳”，这样“民富主富，民寿主寿”。而诗中曰：“天地交泰化成功，朝野咸安治道亨。皇极殿中龙虎静，武当云外钟鼓清。臣居草莽原无用，帝问刍蕘苦有情。敢把微言劳圣听，澄心寡欲是长生。”张三丰在短信和诗中给永乐帝开的妙方是“屏欲崇德”和“澄心寡欲”（心要干净，欲望要少），这样老百姓富裕了，身为人主也就有德行了；老百姓长寿，身为人主也就长寿了，内中暗含修道之意。

永乐十四年，在胡广的再三请求下，张三丰同意与其一同去见明成祖朱棣。张三丰先自飞身而去，降临宫殿。彼时朱棣正在上朝，忽见一位衣衫褴褛的道人披着鹿裘立于台阶上，稽首带笑。成祖询问知是张三丰，便“殷勤命坐，即求谈道”。张三丰于是唱了一曲访道求真走天涯的歌，唱罢，从容走下台阶，一时祥云布满整个庭院，良久才散去。张三丰亦不见了踪影。

明成祖与大臣们感叹不已，方才真正相信，这世上果然有真仙。崇道的朱棣还不时命道士设斋醮，为他的父母祈“冥福”。有时设斋醮三日，有时则长达七昼夜。在徐皇后于永乐五年去世后，他命天师张宇初于朝天宫率众道士设大斋醮，为徐皇后祈福。朱棣这种大设斋醮的做法开了先例，后世皇帝纷纷仿效。

此外，永乐四年（1406年），明成祖鉴于以前的《道藏》大多散佚，便命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编纂《道藏》。这项工程一直到正统十年（1445年）才全部竣工，历时三十九年。这部《道藏》即名为《正统道藏》，共5305卷，分装480函。万历时，鉴于《正统道藏》搜罗不全，且《正统道藏》刊印以后的近二百年间又有不少新的道书问世，于是，万历帝命第五十代天师张国祥负责修《续道藏》，称《万历续道藏》，共180卷，分装32函。经过明代这两次大规模的编纂，道教经典文书基本搜罗无遗，促进了道教在全国各地的传播。而今天人们所看到的《道藏》正是明代编纂的。



### 宫廷再现神迹

明朝的崇道之风从明成祖开始，到嘉靖、万历皇帝时达到顶峰。可以说，明朝的皇帝基本都崇信道家，只是崇信的程度不同，明世宗嘉靖、明神宗万历最为崇信，而且有些还有缘见到了张三丰。

#### 一、皇帝崇道

明孝宗被视为明代的中兴之主，但他崇奉道教毫不逊色于其父明宪宗。他甚至命道士崔志端掌太常寺，“带衔为礼部尚书”。孝宗的儿子武宗喜佛，但他亦不排斥道教，南巡时还曾命天师为他除妖。

到了世宗嘉靖帝，其崇奉道教就很少有人可类比了。嘉靖曾三次给自己加道号，第三次达到34个字，其字数之多，在世俗间无以伦比，在古代，封号字数越多越显得尊崇；而且他还给自己的父母也加了道号，这也是非常少见的。

明成祖时期武当山宫观已是相当壮观，紫霄宫达一百六十间，但嘉靖却下诏“扩大至八百间”。嘉靖时期营建的宫观名目繁多，耗费惊人。《明史·食货志二》明确记载：“世宗营建最繁，十五年以前，名为汰省，而经费已六七百万。其后增十数倍，斋宫、秘殿并时而兴。工场二三十处，役匠数万人，军称之，岁费二三百万……经费不敷，乃令臣民献助，献助不已，复行开纳。”

此外，嘉靖帝将斋醮当成了每日必做的功课，同样耗费惊人。他还宠信一大批向他献方药术的道士，给他们授予高官头衔。显然，嘉靖帝不顾百姓疾苦地崇道，已经违背了道家真义，与张三丰告诫明成祖之语背道而驰，同时因为极度崇道，嘉靖帝大力毁佛寺和佛像，这都为明朝走向衰败埋下了伏笔。

明穆宗隆庆帝继位后，因朝政废弛，采取了一些限制道教措施，但他对真武帝仍很崇敬。

隆庆帝在位六年后，儿子万历帝即位，是为明神宗，亦痴迷道教。不过，万历并不公开排佛。他像祖父嘉靖帝那样，整月整年地在宫中做斋醮，为此居然一连十几年、二十几年不上朝。他下诏重建道教宫观，还命道士修《续道藏》。正是在万历年间，对关羽的崇拜被

推广到全国各地。

万历之后三个明朝皇帝中，光宗在位仅一个月，据说是因服丹药致死。熹宗天启帝也推崇道教，敕令修建武当山玉虚宫。《明史》说他也是服丹药而死。

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帝最初也崇道并排佛，但他后因自己祈求的道教诸神不能帮助他挽救明王朝的危亡，所以在汤若望等人的引导下改奉天主教，为此还毁掉了明成祖修建的玉皇殿。但大明的气数还是尽了。

明朝皇帝崇道除了表现在对真人封号外，还大修道观。不仅在武当山，在京城也修建了不少庙、观。《明史·礼志四》载北京的“京师九庙”就是明成祖和他的后世子孙所建。这“九庙”供奉的都是道教神灵。

#### 二、张三丰显真身

据《张三丰全集》载，天顺三年（1459年），张三丰再次来朝，见明英宗虔诚修道，遂显真身，并对英宗说，希望他“修己安人，黜邪崇正”，说罢隐去。明朝的郎瑛在《七修类稿》中也记载了张三丰来见明英宗一事，说张三丰“须髯竖上，一髻背垂，面紫，大腹而携笠”。

在张三丰隐去后，英宗亲下敕封诰命，诰命中说张三丰“奇迹罕见”，“芳姿颖异，雅志孤高。得仙术之秘诀，饵金鼎之灵膏。去来倏忽，实得造化之机；隐显微芒，吻合乾坤之妙”，因此赐其号为“通微显化真人”。

明宪宗时期，再敕封张三丰为“韬光尚志真仙”。明世宗嘉靖则封张三丰为“清虚元妙真君”。他听说张三丰在南京，便下诏寻得张三丰所有撰写的篇章，仔细研读，还在其原来住的地方，建清虚观。明熹宗天启年间，张三丰降坛显灵，熹宗下诏封为“飞龙显化宏仁济世真君”。之所以明朝皇帝敕封的号中有“真”字，应该是因为道家是修真的。

而明朝两代皇帝在武当山的老营宫前修建了一座碑楼，内立两尊特大的石碑，一刻是明成祖赐张三丰书，一刻是明英宗赐张三丰诏，称其为“真仙”。

### 家家向道

在张三丰广为流传的神迹的影响和明成祖的带动下，各地藩

王也纷纷仿效，修建道观，道教的地位大为提升。而皇帝、大臣们的崇道之风对明代社会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。在鼎盛时期，明朝家家向道。而且每到春天二三月间，江南许多地方都组织大规模的武当山进香旅行，这也扩大了道教的影响。不仅如此，老百姓生活的各个领域几乎都能看到道教的存在，如老百姓广泛供奉门神、灶神、城隍、土地神、妈祖等保护神，供奉风伯、雨师、雷公，祈求风调雨顺。皇帝亦根据老百姓生产、生活所需，不时加封道教神祇。

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，在明中期以后，随着工商业的发展，各行各业兴起了一股行业神崇拜风。如制墨匠祭祀吕祖，文具商祭祀文昌帝君，打铁匠祭祀太上老君，甚至连娼妓和窃贼也为了显示自己是一个行当，亦分别奉祀管仲和时迁。这些行业保护神绝大多数属于道教系统，有的还受到明朝皇帝的册封。

而此前唐宋元时广泛流传的“八仙”名讳，在明代也最终确定下来，即李铁拐、钟离权（汉钟离）、张果老、何仙姑、蓝采和、吕洞宾、韩湘子、曹国舅。其中的吕洞宾（号纯阳子）被嘉靖皇帝封为“纯阳孚佑帝君”，以示尊崇。

无疑，明朝的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道教神的形象也不是偶然的。如长篇神魔小说《封神演义》几乎是道教诸神斗法的故事。《西游记》虽以唐僧去西天取经为主线，但孙悟空“大闹天宫”却闹的是玉皇大帝。《水浒传》开篇就说张天师放出妖魔108人，这就是后来的梁山108将。

相对于佛教来说，道教地位的上升还与明代的宗教政策有关。朱元璋于洪武元年用诏书颁告天下，只允许佛、道二教流传。洪武六年规定，出家为僧、道者，要在考核后，由官府发给“度牒”，始能出家，并限制了出家名额。因此，明代没有出现因僧、道太多而影响国家赋役的严重问题。

虽然到了清朝，因皇帝信萨满教和佛教，道教地位有所下降，但明朝时曾经的鼎盛与繁荣却不曾在历史的长河中湮没，绵长的道脉在历史的长河里蛰伏着，等待着，等待着再一次接上与神的缘分。◎

## 端午思忠烈 赠扇送清风

文 / 皇甫容

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“端午节”是中华地区重要的节日之一。古时认为农历五月是“阴阳争，生死分”的月份。为攘灾驱毒避邪，时人采摘兰草以香汤沐浴，悬挂艾草菖蒲，并“止声色”、“退嗜欲”、“定心气”的端正，驱赶邪气。

端午节以世代相传的传统方式，为华夏子孙冀下远离恶毒邪佞的保身之道。在数千年的历史中，端午节随着人文的演绎，逐渐丰富了内涵。

一心求真为民的楚国大夫屈原于五月五日含冤投江。“亦余心之所善兮，虽九死其犹未悔”的屈原不与恶势合污的忠贞，为端午之风增添了深沉刚烈的气度。这股正气逾越千年传递至今，今天品来浓郁酣畅，令后人无限缅怀敬仰。

春秋时期吴国大宰，贪财好色爱越国贿赂，向吴王夫差进谗言陷害忠臣伍子胥。吴王赐他宝剑，伍子胥由此而死。含冤而死的伍子胥，愤恨之气使其“驱水为涛，以溺杀人”，后“欲慰其恨心，止其

猛涛”，浙江一代皆建子胥庙，尽释缅怀尊敬，安抚告慰冤灵。

东汉孝女曹娥因父溺毙江中，不见尸首，昼夜沿江号哭。曹娥在五月初五投江后抱出父尸，后人为纪念曹娥孝感动天之义，为她建庙立碑。

这三段和端午节有关的历史传说，“屈原九死未悔忠义，子胥孤臣孽子之愤，曹娥孝感动天之义”，忠臣烈女的义行为端午增加了浓厚的深沉和刚烈。



不过端午节的深沉刚烈之气，随着唐太宗端午赠扇的故事，也另辟蹊径的赋予了新的内涵，世人由此也走出了端午的伤感。

据《唐会要》记载：“贞观”十八年五月，太宗为飞白书，作鸾凤蟠龙等字，笔势惊绝。谓司徒长孙无忌、吏部尚书杨师道曰：“五日旧俗，必用服玩相贺，朕今各赐君飞白扇二枚，庶动清风，以增美德。”

原本，扇子和美德之间风牛马不相及。东晋时期袁宏要去担任地方官，友人谢安赠他一面扇子，勉励袁宏为当地百姓送去仁义之风，“奉扬仁风，慰彼黎庶”。因此扇子便拥有了仁义美德的寓意。或许，太宗有意效法古人的用心贤德，于端午赠送大臣菖蒲扇，不仅释大唐圣主的体恤，也取菖蒲清香驱邪之意，勉励大臣弘扬仁义古风。

太宗首开端午赠扇之风，也意在取清慧美德善化人间。希望后世子孙常常“庶动清风，以增美德”，确保世代长安。因此端午节，因太宗这段额外的花絮，增添了大唐富庶包容之中的清风雅趣。

在“阴阳争，生死分”的时月，采摘艾草菖蒲高挂门庭，时人以兰草香汤沐浴后，“止声色”、“薄滋味”、“退嗜欲”，众人皆以静心端正，请祈攘灾避邪，远离“蟾蜍、蛇、蝎、蜥蜴、蜈蚣”这五毒。在道早已崩坏的末世，一切荡然无复子遗时，太宗赠扇（谐音：赠善）更有现实意义，“庶动清风，以增美德”的这股清风，或更适合端午的原意和初衷。◎